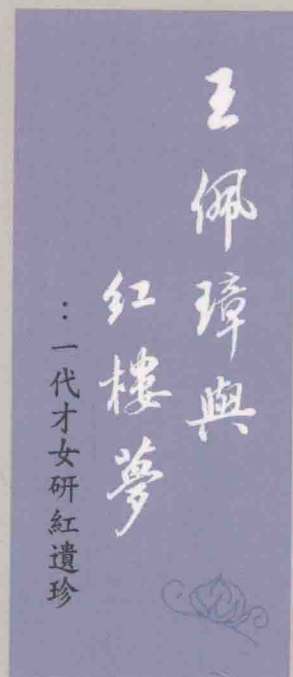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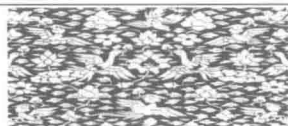
里仁《紅樓夢》叢刊甲編②

Le Jin Studie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eries I - ②



劉廣定 編著



王佩璋與紅樓夢

：一代才女研紅遺珍

編著者◎劉廣定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王佩璋與紅樓夢：一代才女研紅遺珍／劉廣定編著．——
初版．——臺北市：里仁，2014.11

面：公分

ISBN 978-986-6178-86-3 (平裝)

1.紅學 2.研究考訂

857.49

103021911

• 本書經編著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王佩璋與紅樓夢

：一代才女研紅遺珍

劉廣定 編著

校對人：徐爾繪·編著者自校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編輯委員：王國良·陳益源·張高評

鹿憶鹿·廖棟樑·鄭文惠

發行人：徐秀榮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rnbook.webdiy.com.tw

QQ：2562105961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西元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版

參考售價：平裝新台幣 450 元

ISBN：978-986-6178-86-3（平裝）



王佩璋女士與夫婿楊乃雯先生

目錄

目錄

早凋的奇葩——研紅才女王佩璋（代序）	1
王佩璋的研紅成就	19
王佩璋研紅文錄之說明	43
王佩璋研紅文錄	
1. 紅樓夢簡說 (a)	47
《紅樓夢》簡說 (b)	57
2. 我們怎樣讀《紅樓夢》	67
3. 《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	75
4. 新版「紅樓夢」校評	97
5. 《紅樓夢》評介	109
6. 王佩璋發言紀錄——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紅樓夢》研究座談會	115
7. 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	117

後記

8. 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度	129
9. 紅樓夢校字記所用本子及其簡稱與說明	141
(a) 目錄及第一回	143
(b) 第八十回	157
10. 《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	171
11. 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	181
後記	225

早凋的奇葩——研紅才女王佩璋（代序）

引言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不幸的時代，由於種種不同原因，不計其數的優秀炎黃子孫，未得施展長才遭到埋沒，摧殘，甚至在盛年就喪失了生命。一九五零到一九七零年代的中國大陸就曾一度是這樣的時代。據孫玉明先生所著《紅學：一九五四》（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報導：王佩璋女士（一九三零—一九六六）是一位才華洋溢的紅樓夢研究者，北京大學中文系一九五三年畢業後，任職文學研究所。曾協助俞平伯校勘了前八十回的紅樓夢，又寫過好幾篇有價值的研紅佳作。但在蒞薈初綻，即將盛開之際，一九五八年因「大躍進」運動，她從文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變成了棉織廠工人，兩年後因故又被文學研究所解職。她可能因受打擊而得了精神上的疾病，從此未再工作。一九六六年文革起時，再受衝擊而自殺身亡。

筆者很早就知道王女士的大名。一九六零年左右，曾在台北的東方書店買到一本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趙聰所著《俞平伯與「紅樓夢」事件》小冊，談大陸一九五四年的文藝整風運動，其中有一節為「王佩璋抨擊新版紅樓夢」。但當時對紅樓夢的研究了解很少，該文也只說她當時剛從北大畢業，是俞平伯的助手，從事校勘紅樓夢的工作，曾指出新版紅

樓夢有許多錯誤。如此而已。至於俞平伯的名字雖中學時代已讀過他的《清真詞釋》和《讀詞偶得》，但有關他的紅樓夢研究，則是一九五八年聽林語堂先生講「平心論高鶚」時才知道的。唯一九七零年代讀到他的《紅樓夢辨》及《紅樓夢研究》時，印象並不好，覺得他翻來覆去，長篇大論都沒說出什麼令人信服的道理。一九八九年夏，去瑞典參加國際化學聯盟的學術大會，返台途中到香港探望胞叔，並在舊書店購得《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一集（一九五五年版），內有王佩璋女士一九五四年所寫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和「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度」兩篇文章，前者說明她寫過四篇文章由俞平伯署名發表，後者是對《紅樓夢研究》的批評，甚佩服其觀點與直言。一九九三年於北京中國書店覓得《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下冊（一九八四年版），又閱及她一九五七年所寫「《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更覺其當年的見解實已超越其後三十年來的許多「紅學家」。當時一直納悶：為何此人後來不見蹤跡，紅樓夢辭典中也無所記？曾有一探究竟之思，唯蹉跎時日，延宕至今。

吉光片羽

實際上，孫玉明先生撰寫《紅學：一九五四》時也到處查不到有關王女士的資料。眾多《紅樓夢》的研究者似都忽略了她的存在和她曾在紅樓夢研究上的貢獻。二零零三年《紅學：一九五四》問世之前，有關《紅樓夢》研究的資料中少有提及者。筆者經眼的似只有一九七

五年趙岡夫婦的《紅樓夢研究新編》（聯經出版公司）引用了她對《懋齋詩鈔》與「後四十回」的研究成果，一九九七年白盾先生主編的《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評介王女士代俞平伯寫的文章，並說：「王氏是個很有才華的青年，可惜英年早逝。」（頁三四三），以及杜春耕先生在《紅樓夢學刊》二零零一年第四輯所發表「程甲、程乙及其異本考證」一文將她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列為「主要參考文獻」。華文出版社二零一零年出版劉宜慶所著《浪淘盡：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中介紹了王佩璋，內容大致同於《紅學：一九五四》。唯在頁二零四卻說：

她沒有留下專著問世，留下的幾篇文章中想像不到她的模樣，也許沒有相愛的對象，至死未嫁。

兩年多前獲知，王女士的親人蕭建民先生曾寫過一篇「王佩璋遺事」透露其簡要生平，乃覓得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北京青年報》，知她並非「至死未嫁」，現將原文轉述於下：

王佩璋一九三零年生於河北省豐潤縣一個大地主家庭，後舉家遷往北京。其生母原為丫環，後納為妾。王佩璋天資聰穎，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但自生母病逝，遂遭冷落甚至虐待。她因不堪凌辱離家出走，發奮苦讀，考入師大女附中，一九四九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在北大就讀時期，王佩璋與我四舅楊乃雯（一九二九年生於北京，一九四九年考入北大經濟系）在學生食堂就餐時相識，二人談論文學、歷史，相知相戀，一九五三年畢業後結婚，婚後無子女。

王佩璋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名王佩琪，無聯絡。

王佩璋在社科院做俞平伯助手時，俞平伯對她的文學造詣大加讚賞。楊乃雯曾說：俞平伯稱王佩璋所寫詩詞「無一字可改」。

「文革」前，王佩璋就因政治原因，受到刺激，患上精神病，經常購買大量皮鞋，衣物閒置，一九六六年六月（或七月）王佩璋被紅衛兵批鬥後服安眠藥自殺，送到醫院搶救不及，不幸身亡，終年三十六歲。

楊乃雯從北大畢業後分配至國家計委工作，「文革」中受王佩璋問題牽連，赴「五七幹校」勞動後未能回到原單位，遂遷往天津，在和平區一個街道辦事處工作，鬱鬱寡歡，於一九九八年去世。

另在《紅學：一九五四》書中，曾引用現為著名學者，比王佩璋晚兩年進入文學研究所工作的劉世德先生所說：「王佩璋很有學問，也很有個性。她在大學時學習就很好，是拔尖的人才。她對《紅樓夢》很熟，可說是倒背如流，其古典詩詞的造詣也很深」。又說「我又和王佩璋同志同在一間辦公室。我看到她的辦公桌兩旁排著兩棵紙，幾乎和桌子一般高，問明了

方知道是平老校訂《紅樓夢》的書稿，以及她寫下的校勘記」。劉先生還說過，王佩璋被開除了公職後，愛惜人才的文學研究所負責人何其芳曾「推薦王佩璋到中華書局去當編輯，但不知為什麼，王佩璋始終不願意去」。

劉先生又於「在文學館聽講座」的演講「《紅樓夢》之謎（三）」時提過王佩璋（《新解紅樓夢》③）山東畫報出版社，頁六七六八，二零零七年），說：「她是一個才女，對《紅樓夢》非常熟悉，可以說是倒背如流，任何一個情節、人物，任何一句話，你只要一問她，她就能給你指出在什麼地方」！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青年報》還有一篇由記者採訪報導「王佩璋是誰？消失在歷史中的小人物」。其中依據劉世德所說：「一九五七年俞、王二人勘校的八十回本《紅樓夢》出版時，王佩璋為了稿費的分配問題還鬧過糾紛，認為自己工作辛苦，應該至少和俞平伯平分稿費，直到所長何其芳出面調停，才解決了矛盾。……王佩璋是一個非常有個性、很要強的人。」另一位同事朱錦霞對她的印象是：「她口才厲害，常常在辦公室裏跟大家辯論，並頗為此自得。」

俞平伯除稱讚王佩璋所寫詩詞「無一字可改」外，一九六二年在《重訂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弁言》中曾肯定她的校勘工作說：「校字記原由王惜時（按，即王佩璋的筆名）君寫，她現在不在這裏了；因此重校時，便由我自己來改寫，又增刪了若干條，雖頗費力，恐怕未必搞得更好。」甚至一九七九年寫「茄胙、茄蕹」一文時還提及當年校書之事時，而感慨地說：「余年

齒衰暮，無緣溫尋前書，同校者久歸黃土，不能再勘切磋，殊可惜也。」（《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號，頁一三二—一三三）又，俞平伯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的〈霸縣煎茶鋪日記〉（《俞平伯全集》第十卷，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頁三六五）記云：「文學所王平凡、張書明來。得王佩璋書，將原件轉何其芳。」是他的日記唯一提到王佩璋的一次，但未言及書信內容。

雛鳳清於老鳳聲

一九五三年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詩人汪靜之整理的新版《紅樓夢》。才從北大畢業不久的王佩璋很快就發現了其中的許多問題，並且隨即寫成『新版「紅樓夢」校評』一文，一九五四年初寄給《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編輯部，對這個新校本提出了嚴正的批評。她不但指出許多錯誤與不妥之處，更明說：新本雖然自稱是根據「程乙本」，但實際上卻是一九二七年亞東圖書館所發行與真正「程乙本」出入很大的「亞東本」。她還說：「不當用問號而用問號之處太多，新本也多沿其誤。全書中我看到有四五八個問號是不該用而用的……（新版）種種標點不妥的地方我看到有九十一處，其中由於亞東本連累的有七十九處。」並說：「在亞東本之外，還另有許多改動。看編者的意思，好像是有希望花力不多，從改動一兩個字而就能使這新本成為定本的企圖似的……」。毫無保留地指責編者「偷懶」，顯示了青年人的率直、勇氣與對學術問題所持的正義感。

按，「亞東本」《紅樓夢》出版之後，坊間許多標點本皆倣之，故錯誤也從之。例如舊時

坊間本第六十回趙姨娘為茉莉粉事辱罵芳官，芳官哭辯時說：「……我又不是姨奶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樣的斷句很不好懂，筆者六十年前讀「世界書局本」《紅樓夢》時即不了解其意義，蓋趙姨娘並未說到拜把子的事。王佩璋則指出「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是句北京話的歇後語。故應改為「……我又不是姨奶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樣，意義就清楚了，許多後出的標點本都隨之改正。類似改正處還很多，皆是王女士的貢獻。

因為她的文章牽涉到國家級出版社的名譽問題，再加上「文學遺產」的編輯不知道這位無藉藉名的王佩璋所言是否符合事實，故採取一謹慎的處理方式——先請作家出版社核實此事。作家出版社三月四日給「文學遺產」編輯部寫了一封信，承認錯誤，並希望能把此信和王佩璋的文章同時發表，讓大家知道作家出版社面對問題的態度和做法。她這篇文章於三月十五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第二期刊出，這是她大學剛畢業後就獨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真是「雛鳳清於老鳳聲」了。無怪乎「文學遺產」編輯部給予大力支持，而且作家出版社還邀請她協助他們的修正工作。

孫玉明先生的報導說，王佩璋這篇「新版《紅樓夢》校評」於一九五四年《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第二期刊出後，引起在北京進修的李希凡和在北京教中學的楊建人（筆名藍翎）之注意。他們是山東大學中文系一九五三年畢業的同學，原即不滿俞平伯發表在《新建設》雜誌上的「紅樓夢簡論」一文，看到「小人物」王佩璋批評「大出版社」出版品的文章在《光

明日報》刊出，激起他們這兩位「小人物」批評「大人物」俞平伯的豪情。乃合寫成「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後寄給母校山東大學的《文史哲》，於九月號刊出。至此，發展似都是正常的。然而，不久後情況就轉變了。（其經過有不同的說法，本文從略）

政治運動中展現學術能力

依據《紅學：一九五四》所述，毛澤東看到李希凡和藍翎這篇批評「紅樓夢簡論」的文章後，原指示《人民日報》轉載，後因故改刊於九月底出版的《文藝報》第十八期。李、藍兩人八月間又合寫一篇「評『紅樓夢研究』」寄給《光明日報》，也於十月十日刊出，再次引起毛澤東的重視。他因此堅定了「要在文化界發動一場政治運動的決心。」乘機發動藉討論「紅樓夢研究問題」而最終目的在批倒胡適的大運動。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澤東給中央政治局及文藝界有關領導人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有所指示。中國作家協會便在十月二十四日召開了「紅樓夢研究座談會」。與會者除列席的報刊雜誌社編輯、記者外，共有包括李希凡、藍翎和王佩璋在內的四十九位「專家學者」。鄭振鐸為主席，致辭後會中發言的只有十九人。俞平伯首先發言，然後就是王佩璋。在發言中，她沒有批評俞平伯，也未對李希凡與藍翎的文章表示意見。只說明自己代俞平伯寫了「紅樓夢簡說」，「我們怎樣讀紅樓夢」，「紅樓夢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和「紅樓夢評介」四篇文章，並表示：

關於代俞先生作文章這件事，我還應該另外檢討，我這裡只說明事實的真象。在這篇文章中，除了上述俞先生改動的部分外，如有文藝思想問題，由我個人負責。

孫玉明先生稱讚她「不僅充滿了自信，而且大有一人做事一人當之氣概。」真是一點也不錯。

王佩璋所代筆的文章與她個人所著的「紅樓夢簡說」，都將《紅樓夢》小說的思想意義及社會意義提升到揭露封建社會腐朽與罪惡的高度。每篇的結尾處都引用了恩格斯給明娜考茨基信中說的：

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如果他能真實地描寫現實的關係，打破對於這些關係的傳統的幻想，粉碎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引起對於現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懷疑；那末，縱然作者沒有提供任何明確的解決，甚至作者沒有明顯地站在那一邊，這部小說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做為「給紅樓夢一個更簡括，更正確的估價」。表示她在毛澤東在發動那場驚天動地的批判運動之前，已先將馬列思想的文藝理論運用到《紅樓夢》的研究中了。

在這思想批判運動之中除發表了未經俞平伯刪改的「紅樓夢簡說」原稿，王佩璋又寫下「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和「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度」兩文。她認為「這一討論的目的在於清除殘存在古典文學研究工作思想中的資產階級立場、

觀點和研究的方法。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論爭。」俞平伯與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研究方法，以及封建階級的思想，皆須清除。她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有五項「不應有的錯誤的態度」：

一、把封建大家庭的典型意義，和廣泛的社會意義縮小為作者的自傳。

二、沒有分析批判。

三、只研究前八十回，貶斥後四十回。

四、對『紅樓夢』的一些認識全據脂批。

五、研究工作完全是從興趣出發的。故「除文藝思想有許多錯誤外，研究的態度也是不夠嚴謹、踏實、負責的。」

除「文藝思想」和社會價值觀乃見仁見智，其他的許多批評，筆者大都可以同意。另外，孫先生特別指出：「王佩璋的批判文章，較之當時那些用詞尖刻無限上綱甚至極盡詆毀謾罵之能事的文章，不僅具有濃厚的學術氣息，而且語氣也相對緩和。……若剔除那些裝點門面的『批判性』言辭，仍不失其學術價值。」（《紅學：一九五四》頁三四）筆者亦可同意。但更要強調的是，拙見以為對一位大學畢業才一年多的青年而言，除腹笥外，她對所涉及研究課題的觀察、分析和判斷能力都已不在俞平伯及其他學者之下。如再給予適宜的滋育與引導，神州國學界出現一株長年盛開的奇葩異卉，當指日可待。

可惜，在六十年前那個荒謬的時代裡，有權勢的國家領導人一心玩弄政治鬥爭，只重視忠於教條的戰鬥能力而非其他。因此，李、藍兩位被調入《人民日報》工作，很快地又寫出十幾篇不如首先兩篇之有創見，且不佞看來學術內容頗為空洞的文章，並由作家出版社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將之結集出版了《紅樓夢評論集》！李希凡先生更被指派為政協委員，之後青雲直上，成為文藝界之一領導者。王佩璋女士則仍在文學研究所繼續校勘《紅樓夢》，似乎沒有獲得任何人的青睞。

再鳴驚人

約在一九五六年中，《紅樓夢》校勘結束，王佩璋隨後寫了兩篇可說是擲地有聲的文章。一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日發表於《光明日報》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一是一九五七年六月發表於《文學研究集刊》第五冊的「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後者包含「曹雪芹的生卒年」，「關於脂硯齋和畸笏叟」與「紅樓夢甲辰本瑣談」三個子題。此四者現在仍是紅樓夢研究的重要問題，也都是在一九五四年她已揭出的問題。

《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當時有兩種說法：胡適、俞平伯等人認為是高鶚補作；反對者則以為仍出自曹雪芹之手。王佩璋經由仔細分析小說文本，認為「後四十回絕大部分都不是高鶚作的，可能真是程偉元買來的別人的續作。」她的依據主要為：

（一）「程甲本」約有一百十二處優於「程乙本」；